

论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

刘俊 翁旭东

摘要: 伴随着世界全球化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面对国际传播的语境更迭与理念重构,历史上长期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的全球叙事体系的逻辑裂痕不断加深,陷入难以逾越的解释困境。作为全球南方的积极行动主体之一,中国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为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的探索带来有效方向与切实方案。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的核心内涵至少包含促进主体开放自由交流的平等化叙事、彰显民族魅力与多元表达的个性化叙事、网感语态强化表达创新的青春化叙事、忠实全面展现他国形象的立体化叙事,以及推动认同建构同心共鸣的共同化叙事。透过多元知识谱系的解读与辩证,可以发现,这一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根植于“尚公”“贵和”的传统思想资源,以精神交往与人本主义作为本体论基点,展现出同转文化的范式转化相呼应的认识论特征,形成基于话语的偶然性本质与话语主导地位建构策略的方法论框架。

关键词: 国际传播;全球传播;新型全球叙事;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8-0165-12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全球叙事是一种通过建立具有稳定倾向的全球性叙事框架,从而实现跨越不同国家疆域与文化边界以描述现实世界、知识演进与人类活动的叙事活动。全球叙事的目的在于为影响和形塑各地公众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信息传播提供一种特定的全球性结构方案,并由此推动文化的传播与国际形象力的提升^[1]。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激荡寰宇,国际局势与全球发展经历着新一轮的大分化与大调整。伴随着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到来,脱胎于西方语境的全球化范式正遭遇重大的现实冲击与问题挑战。由美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叙事体系正滑向失语、失衡,特别是在新一轮“贸易战”的背景下,

这些困境与问题正愈发明显。

当前,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朝着多元平衡的理想状态演进,“全球南方”积极推动替代性、建设性与发展性的全球信息文化传播实践,从广阔的本土探索出发,为构建一个有所区别的“南方方案”提供了诸如乌班图主义(Ubuntu)^[2]、南方传播学(Comunicología del Sur)^[3]、“亚洲中心”^[4]等一系列丰富且鲜活的实践参考与理论启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积极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与新型全球化模

收稿日期:2025-05-01

基金项目:2024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1591);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际传播学科育人体系的建设重点与升维路径研究”(CUC25BH02)。

作者简介:刘俊,男,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北京 100024)。翁旭东,男,通讯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师资博士后(北京 100024)。

式的探索,为世界交往与全球叙事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那么,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具体是什么?其拥有怎样的内涵与逻辑?尽管当前我国在新型国际传播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知识体系搭建尚处于进程之中,然而,立足新旧全球化方案逐渐走向转换的关键时期,我国作为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讨论与廓清无疑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围绕这一问题,本文拟首先就当前全球叙事所面临的困难挑战,与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范式的迁移进行分析。其次,基于我国国际传播的整体实践情况与新近涌现的全球热点传播事件,挖掘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具体内涵,并尝试阐释这一叙事体系背后的理论逻辑依据。最后,就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关切做进一步讨论与展望。

二、全球叙事体系所面临的语境更迭与理念重构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5],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人类历史创造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尽管西方在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格局演进中长期保持并在今天依旧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横亘在其全球化想象与历史进程间的裂缝正因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而不断加深。而当传统全球叙事框架所存在的逻辑褶皱进一步凸显,逐渐走入霸权困局与解释困境之时,便更加需要关注并推动全球叙事理念的重构与升维,以及时适应全球化进程中传播格局与文化主体关系的调适。

1. 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的历时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最早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6]。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长期发展中于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方面积累起突出优势。基于这种先发优势的联动,其得以依托文化、艺术与传媒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完备的国际传播秩序,形成对全球叙事的垄断优势。

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全面开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对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攻击和遏制阐释为所谓“遏制邪恶帝国并领导自由世界走向胜利”的叙事^[7];另一方面,将发展传播学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有力理论工具,向经历民族解放运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广,使其在学习、接受西方发

展模式的过程中完成现代化,潜移默化地认同西方的优势地位^[6]。当美西方随着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而宣称迎来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人类历史的“终结”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成为其解释后冷战世界的全新主要叙事,将国际叙事的主旋律从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向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斗争。进入21世纪后,战略传播成为美国全球叙事的基本框架,用以说服特定受众采取特定行动来支持美国的目标,以诋毁对手意识形态和政策、揭露对手错误或谎言等方式贬损对手信誉和合法性,引致对手采取或放弃特定的行动^[8]。

当前,发展中国家尽管硬实力不断增强,但仍无法完全摆脱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叙事。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科技等领域相继出现的“迟发展效应”(late-comer effect)在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上却很难奏效。所谓“迟发展效应”,是指相对于先发者,在一定条件下,落后本身可转化为潜在的优势^[9],若善于利用迟发展带来的有利因素,可实现超常规发展,形成对发达地区的“赶超效应”^[10](也即后发者可以迅速赶超先发者)。“迟发展效应”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失灵,恰恰说明,国际传播是一项由多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性变量,其底层逻辑不仅依赖于经济与军事上的强权支撑,还需要具备将前者有效转化为文化、艺术、价值等软实力的能力。这两类实力的同构体系与互动机制的形成是长期且复杂的,后发国家很难直接复制和快速赶超。全球南方在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上还需久久为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与时代主题的探索之路。

2. 数字平台的兴起与文化杂糅的转向

如果说传统全球叙事是大众媒介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那么在信息传播技术对国际传播的穿透和形塑作用愈发关键的今天,这种因果逻辑及其适用土壤正因数字平台跃起成为全球新的信息基础设施而被打破。正如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等学者就平台化社会所指出的,国际传播转变为“很大程度上依靠线上的平台生态进行规划”^[11]。

数字平台极大地实现了对大众个体叙事的赋权,使得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能够直接参与到数字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当中。与此同时,平台算法、智能推荐、数据搜索等技术可供性为个体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围绕“被看见”与“被谁看见”的问题构建起一套超出传统全球传播宰制秩序的新体系。普通用户成为国际传播中异质而规模庞大的“先导性

主体”,得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多元表达。平台还为全球信息集散与社会互动构建起一个高效而普遍的重要空间。特别是诸如美国 TikTok 用户涌入中国社交媒体 App“小红书”等一系列平台迁徙现象的出现,显现出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区隔与边界正日趋模糊。在高度连接性加持的全球时空下,面对网络空间中疆域的消失,传统上因技术无法跨越地域区隔而形成的各种“本土”文化走向交融,经由平台反复传播、改造与再生产走向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

有观点指出,文化杂糅已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生成的主流形式,各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混合组成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着“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的变异和转型^[12],其在世界范围内所构成的,是一个既是民族的也是异域的、既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文化空间。平台化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间际空间的弹性与流动性,在数字传播的维度印证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所带来的启示,即不同的文化并非分离迥异,文化的交界之处即可行的协商之所和新意义的产生之地^[13]。尽管当前美西方国家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主导尚未被颠覆,但文化杂糅、变迁现象的增加越来越推动国际传播朝着不同文化主体和文化体系平等对话、互鉴交流的理想状态演进。

在这样的语境变迁之下,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传播方法论与自由市场某些激进主义的美西方全球叙事,已难以涵括数字平台驱动下的信息生产与文化交往实践,其所隐含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制和征服逻辑更难以适应杂糅潮流下文化格局与文化主体关系的调整。全球叙事需要走出“主体—他者”“中心—边缘”“流动—回流”的二元框架,基于文化间性与合成视角进行全新叙事理念的构筑,即一方面描述并肯定多元文化并存融合的既有状态,另一方面正视并有力应对发达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对全球南方的影响。

3. 中国引领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的提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案的推进,中国在新型全球化图景的建构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全球中国”作为探索“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叙事的重要方法论,在学术界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当下集中讨论的关键议题。有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

新时代中国国际大局观的基础,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智慧^[14]。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叙事正开始替代新自由主义,主导发展话语^[15];“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倡导以中国作为方法来看待世界,同时深入理解中国方案所具有的全球价值^[16]。

结合作为经验性材料而不断累积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发展升维,与国内外学界长期积淀而来的学术性思考来看,中国引领的全球叙事旨在突破“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图式,将国际传播的逻辑重心转向主体间性,倡导解放和赋权国际传播交流中的文化行动主体,将不同主体置于独立对等地位,使多元参与主体在自由意志支配下通过协商对话实现平等交流与均衡传播,达成“自我”与“他我”的融通与转换^[17]。

这种“主体”与“主体”的认识论,并非停留在国家、地区以及文明的宏观层次,而是进一步聚焦到世界各地的民众本身,以人为本、以人为媒,在彼此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表达中实现认知对齐、民心相通,以情感共同体构筑新型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如此,在理解与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从人民出发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打破既有认知障碍,达成相互理解与互补融合,以互通共荣应对人类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当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逻辑轮廓得以在不断描摹勾连中趋于明朗,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将思考和解答具体层面的更多问题提上议程。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行动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种方法范式的理念遵循与理论依据由何而来?

三、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种兼具包容度与解释力的系统化创新,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全球叙事在拥抱国际传播格局变革、因应叙事理念升维、深挖中华传统哲学智慧、提炼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一个内涵丰富、多维一体的有机系统。其核心内涵至少包含平等化、个性化、青春化、立体化以及共同化等五个维度,它们相互关联、协同作用,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播哲学,使叙事体系具备“精准滴灌”和“润物无声”的鲜明特质,为切实推动国际传播实现由单向控制到双向互动、由文化

折扣到文化增值、由话语权争夺到话语权共享的转变提供了切实的路径指引。

1. 平等化:促进主体开放自由交流

平等化叙事是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的首要内容和突出特色,其强调国际传播的平权化,推动不同文化主体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民众进行真正自在、开放和真诚的信息和文化交流,从而对当前国际传播中存在的文明优越、文明冲突和文化控制形成超越。

具体来讲,我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所践行的平等化叙事至少包含三个维度的意涵。一是强调国际传播中的对等与公正,反对以某种所谓标准化、终极化的文化或价值模式抹平不同国家与文明的多样魅力,积极构建一种平等、自由的全球文明交融互鉴状态。二是倡导国际传播的去控制化,让国际交往走出美西方传媒体系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限制,在没有阻挠、限制的理想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主体的自由联结与对话。三是主张国际传播的透明与全面,因应新技术赋能的全球机遇打破国际传播中刻意制造的算法黑箱、信息茧房与西洋滤镜,让各国民众得以纠正认知偏差,形成全面、正确的了解。

从各国玩家一起热情分享讨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玩法与体验,到“中国旅行”(China Travel)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性潮流,我国积极倡导的平等化叙事在持续的国际传播交流探索中展现出显著的解释力、吸引力与影响力。特别是今年中美用户在小红书“对账”的热点事件,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跨越意识形态的民间交流图景。

受美国政府关于强制停止 TikTok 平台在美国服务的禁令法案影响,大批来自发达国家钟爱 TikTok 的用户自称“TikTok 难民”,涌入我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在中国网友的友好回应和热情欢迎下开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从开始的“交猫税”破冰飞快进入两国真实社会情况与生活水平的“大对账”,许多国与国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得以澄清,两国网友的国际视野也得到显著扩展。在没有阻挠与倾向性议程设置的情况下,美国网民在对话家常中得以切身感受中国人民的善良、友好与真诚,更对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形成相当直观的印象。

未来的国际传播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户生成的内容与民间自发的交流,而非大面积依赖官方或媒体机构主导的信息流动。来自民间的个体话语在自下而上地影响和形塑全球叙事中日益显现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推进全球叙事的平等化转换

与发展,在实践层面需着重落实的,是推进全球化数字平台的自主建设与发展,为激发各国用户参与积极性,有效实现和保障互联互通、自由对话打造更加开放和透明的理想环境。当各国民众能够摆脱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区隔,按照个人意愿自由自主地开展双向交往、进行“数字迁徙”,当“小红书对账”由个案成为常态,平等化的新型全球叙事才能够更深层次地消除误解和偏见,在不同国家、地区与文化间建立更加坚实的信任基础。

2. 个性化:彰显民族特质与多元表达

个性化叙事也是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的一项重要构成。差异化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信仰、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结构,孕育了各个国家、民族带有鲜明自身特点与标识的多元文明。而每一种文明都拥有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是人类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成果凝结,共同构成全球人类的精神家园。实现文明互鉴交流的基础在于承认每种文明的独特性。

基于“求同存异”与“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个性化叙事强调对于不同文明、文化独特性的肯定,鼓励并积极推动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主体在全球交流中注重其民族性特质与魅力的保持与发扬,以多元文化表达的“复调传播”实现全球文化交流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独立视听艺术家、优兔(YouTube)高影响力作者希鲁(Cee-Roo)2012年发起一项名为“感受声音”的专题创作计划,旨在深入全球南方的不同国家,捕捉当地独特的文化传统、景观风物与日常生活场景,并通过采样这些场景中的独特声音,将其转化为节奏与旋律,进行音乐类短视频创作,从而讲述一个又一个富有民族魅力与文化韵味的故事。

在至今十余年的时间里,希鲁先后到斯里兰卡、塞内加尔、日本、肯尼亚、中国、阿联酋、伊朗等国进行走访与采风,创作出9部风格各异的视听作品。比如,于2018年创作的《感受肯尼亚之声》(Feel the Sounds of Kenya)将创作者在当地为期12天的实地录音整合加工,进而以此为灵感创作音乐,优兔观看量超过310万;2019年推出的《感受中国之声》(Feel the Sounds of China)汇集了中国长江沿岸12个省市里近100种真实的声音,包括藏族民歌、传统曲艺、烟火气的市井美食以及叫卖声,并通过创意性的画面衔接,将中国富有生机的人间众相与美丽绚烂的民族文化呈现给全球用户,视频的全球播放量突破千万。“感受声音”计划以一种简单而有力的

方式,鲜活地完成对全球南方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个性化呈现与颂扬,让各国受众在新奇的视听体验中得以深刻感受到蓝色星球上多样文化与多元表达之美。

个性化叙事所倡导的是一种基于尊重与理解的对话模式,而非单向度的展示与传播。国际传播中的参与主体不仅要自信、积极地展现自身文化魅力,同时要以开放心态认识和接纳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承认其他文化的宝贵价值,让每一种文化与国际传播参与主体的声音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表达的机会,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包容与多元的世界文化生态,让各国人民能够广泛领略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从中汲取充足的灵感和力量。

3. 青春化:网感语态强化表达创新

青年群体,特别是“Z世代”群体,是和世界数字化进程一起成长的一代,也是当前国际传播的主要受众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他们拥有更为综合的技术素养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对于其他文化的态度也相对更为友好。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积极探索在表达方式与话语风格上向青年群体靠近,以网感化、潮流化的表达进行创新突破,使国际传播实践显现青春化转向的鲜明特点。

青春化叙事要求运用当前为海内外年轻网络受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明显网感化的内容形态进行文化交流与观念引流,注重基于中短视频、动漫、流行音乐、网络文学、影视剧作、各类社交媒体形态等兼具创新性、灵活性的新型形态(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形态,如网络视听)进行内容创作和传播。比如,越南在推动本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探索中,将辨识度较高的越南民族文化元素,与电音、嘻哈、说唱等流行音乐形式相结合,充分借鉴吸收中、韩等国音乐产业的理念与模式进行创作,并通过社交网站、短视频平台推广和运营,推出一批在网络上具有流量号召力的网红音乐视听作品,吸引了大批来自不同国家、喜欢使用新媒体的粉丝群体,助推“越流”在全球网络传播中初露端倪,并显现向好趋势。

青春化叙事要求在国际传播中建构年轻化的表达主体,讲述青春故事,满足国际受众的内容期待与阅听习惯,同时也能客观强化关于特定文化与形象的朝气与活力的隐喻。比如,于2025年问鼎全球动画电影榜首、在海外持续掀起观影热潮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便是在中国众多古老神话中选

择了以少年英雄哪吒的传奇故事作为原型进行改编与充实,并对哪吒的形象进行后现代解构,以“丑萌”的外形与世俗化的行为动作打破传统英雄美丽正义的刻板形象,让海外受众在时而诙谐、时而高燃的情节中生动领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焕然一新、别具一格的魅力。

青春化叙事还要求摒弃刻板严肃的叙事语态,积极吸收网络流行语言,将象征性符号提炼、转化为网络模因,打造更具亲和感、松弛感、潮流感与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方式。如此,国际传播能够进一步增强内容和传播语态姿态的亲近感、温润感,减少试图强行改变目标受众认知和价值的凌厉感、陌生感^[18]。

当前全球青年人突出的传媒接受心理,是媒介融合时代由互联网长期培养出来的网感化接受心理,是“数字原住民”和早期“数字移民”集体性格的投影,如后现代式思维、二次元式交往等,这些既是网感的表征,也是网感的来源。即便是中老年观众,也因“全龄”化地沉浸在网络社交媒体式的生存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或者带有网感化心理特征,网感逐渐成为一种“全龄”现象。网感内容可具体表现为:活泼、暖萌、无忌,适度放下包袱的自嘲自黑,跳脱台本的意外,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悬念、创意和反差等^[19]。这些都可以适当地、有智慧地融入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

4. 立体化:忠实全面展现他国形象

他者的“凝视”是主体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因素,他者的“凝视”促进了自我形象的塑造^[20]。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是一个由“自塑”和“他塑”共同实现的混合体,两者的综合作用决定国家形象塑造的实际效果。其中,“自塑”是国家主动地对外进行自我形象建构与传播的活动,而“他塑”作为“塑造和传播客体的国家形象呈现出他国视域下的国家镜像”^[21],更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塑造策略与方式。

受国家利益、国际政治以及文化优越观的影响,西方媒体对发展中国家形象的呈现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意图,使得这些国家的综合形象在全球范围受到扭曲和矮化。与之相对,中国倡导的立体化叙事强调将对别国形象的塑造与本国形象塑造置于同一标准之下,在实践中以全面的视角与多样化手段谋求忠实反映被塑造国客观、真实的国家形象,并积极倡导各国在别国形象塑造中同样遵循尊重、理解、包容与负责任的原则。

自2020年以来,游戏《原神》在世界范围持续走红,并入选2021年至2022年度我国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成为中国第一款真正实现出海并风靡全球的游戏类文化产品。除游戏本身质量过硬外,《原神》对于世界各文明的立体化叙事是能够牢牢吸引国外用户的重要因素。尽管游戏构建了一个名叫提瓦特大陆的架空世界,但大陆上存在的七个国家则全部以现实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原型进行设计,如以法国为原型的枫丹、以日本为原型的稻妻、以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原型的纳塔、以中国为原型的璃月等。无论是从地貌环境、建筑景观,还是风土人情的角度,游戏都大量还原了原型国家和地区特有的形象特征,同时通过细致考究的细节刻画进一步提升了真实感。这种对欧美、日本、非洲等地原汁原味的文化还原让对应国家和地区的玩家对游戏天然地感到亲切,在叙事上拉近了游戏同海外玩家的心理距离,同时也让海外用户能够相信璃月是对中国的真实还原。游戏赋予璃月的种种形象塑造也会潜移默化地被国外玩家转移到对现实中国的认知上,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对外传播。

由立体化叙事再向前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既需要讲好传播主体自身的故事,也有必要讲好他国的故事。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需要以两者的协调兼济、有机配合作为强力支撑。对于他国文化与形象的传播不能流于依托标志性符号的简单再现,而应在肯定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积极有益的思想与价值内涵,运用前沿媒体技术、多种媒介形式、多感官沉浸体验进行创造性表达。以“他者”视角生动讲好“他者”故事,既能够助力对象国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传播效果,客观上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受众对我们的认知框架,对于我们的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产生可观的附加价值。

5. 共同化:推动认同唤起共情同心

《共产党宣言》问世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以“世界文学”的概念展现出对未来全球文化发展走向的深刻洞见。“世界文学”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其重要启发在于克服本民族局限与民族间的隔阂,把创造的精神产品变为世界各民族都能共同欣赏的共同财富^[22]。在国际传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看到这种全球文化建构新的可能。

基于对全球文化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辩证认识,共同化叙事通过有意识地挖掘各国人民的普遍关

切、探寻不同文化间相近相似的价值理念、推动第三文化建构等多种方式,找寻共性、引发共鸣,在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中探索全球文明交融与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在由阿塞拜疆主办的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作为配套影像交流活动的电影俱乐部系列活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主题活动鼓励来自全球各国的创作者围绕农业与农林业再生这一为全人类所关切的环境与食品安全话题行动起来,采取分别摄制、联合播出、共同讨论的模式推出,通过汇聚、呈现来自各国的不同故事与在地经验,共同探讨生产力、粮食与水资源安全的内在联系,以及碳封存对于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像作品风格各异,地域色彩鲜明,涵盖纪录片、电影短片、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横跨非洲、南亚、拉美以及欧美地区,内容主题包括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社区健康、地方经济发展、土壤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效益等多个方面,生动展现了各国在多样化农业实践中的鲜明特色。与此同时,它们有机组合在一起时,则共同完成了对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粮食安全的智慧、出路的重新挖掘和思考,深刻凝结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种颇具“世界文学”色彩的共同化全球叙事尝试,有力强化了各国人民对环境与食品安全这一世界性议题的关注,在国际传播中实现了同心共鸣,为此次气候变化大会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在迈向多元化、去中心的新型全球叙事建构中,国际传播的主体既是本土文化的传播者,又是他国文化的鉴赏者,也是积极推动全球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的联通者。因此,一方面要善于在虚拟的媒介空间主动设置议程,在全球层面培育共同话题,唤起彼此的同理心;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实体性的媒介传播事件的建构,特别是节展、论坛等国际性活动的创办,以实体和虚拟、线上和线下、官方和非官方、商业与艺术、恪守与灵活、经验积累和动态创新等诸多维度的合力作用^[19],推动国际传播各参与主体的共同行动,在新型全球叙事的驱动下走向同心共鸣。

四、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逻辑依据

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并非一套孤立的、自成一体的地方性话语实践,而是具有全球价值的。其突出价值在于从“地方”走向“世

界”,即不仅自洽于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本土需求与在地实践,而且能够依据中国自身的叙事理念与知识体系对全球国际传播中具有一般性的议题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透过中国解读非中国的现象,解决超越中国本土的普遍问题。造就这种叙事理念的昂扬生命力与强大穿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得以深度嵌入多维理论谱系的创新性回应。将其放置于多元理论所织就的逻辑网络之中进行定位与辨析,可以发现,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内核与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相呼应,与精神交往的本体论认识相共鸣,与跨文化迈向转文化的范式变革相共振,与话语建构的偶然性逻辑相互文,在多维逻辑的持续对话中展现出较强的可沟通性与理论通约性。

1.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尚公”“和合”观

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理念建构与路径选择,展现出中华传统思想与智慧的逻辑基底。从人类文明与思想发展的长河来看,国际传播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在数字传媒技术演进与全球化进程的交织发展中逐渐凸显,是一项前后不足百年的“新兴”时代议题。然而,交往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始终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主题,自古以来为代代先民所思考与求索。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可划分为心性之学、治平之学与天人之学“三大纲”,而三学宗旨相同,其共同的终极指归在于对“共在者的命运可能性”的思考与关怀^[23]。新型全球叙事体系正与这些悠久丰厚的思想资源中所蕴含的价值预设一脉相承。正是依托于这种哲学与历史的积淀与转化,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国际传播全球叙事得以展现出吸纳与融合多元文化的独特能力,形成倡导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进步为基础的全新模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这种价值取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的发展与积淀中凝聚成“尚公”思想,是中华民族赖以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与互动的基本原则。“尚公”思想决定了我们在考量各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实施行动决策时,更为侧重整体的价值与利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尚公”精神所蕴含的集体主义的生动诠释。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国际传播全球叙事所蕴含的各个民族、国家、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命运同构的理念,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彰显的思想智慧与哲学逻辑有

高度的意境契合,集中展现了中国尊重整体利益、世界利益的根本立场,与积极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责任担当。

追求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思想内核的另一重要特征。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兼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最高的价值准则^[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讲求的和谐,并非机械、精致的完全趋同,也不是无矛盾的真空状态,而是承认、包容万物各有其性,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平衡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实现“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和谐共生。这种理想的世界秩序,《礼记·中庸》描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经》亦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相近表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否认差异的客观存在,承认事物的辩证统一,力图通过一种多元一体的有机秩序安排,“既不过度放任多样性而致失序,亦不泯除多样性而强为秩序”^[23]。这种和谐理念在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中得以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强调在多样性与共通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正视价值与认知差异,在国际传播中积极搭建沟通桥梁,求同存异,寻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最大公约数。

2. 精神交往与人本主义传播观

对传播的本质进行思考是传播研究的起点和核心,其决定了不同取向下的理论分野与行动差异。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体系中的平等化、个性化、立体化内涵,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与人本主义思想。

早在欧美传播学形成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正面考察了人类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交往(Verkehr)问题,并在后续发表的诸多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与说明。对于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交往必然要替代局部的民族交往而成为现代交往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民族交往必然会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25],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全世界的历史^[26]。相较于当前一些相对狭窄、彼此之间缺少对话的传播理论体系,从宏观传播现象着眼的精神交往理论以其历史的、联系的、运动的观察视角,为解决传播学研究的“结构性贫困”提供了开阔的哲学基础,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推进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尽管欧美的主流传播学研究不乏智慧火花与深邃见解,但其自最初诞生起便深深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如当前对于国际传播与网络传播的理解,仍无法离开经验学派的功能视角。在科学主义的传播观下,传播被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媒介、信息、技术等“物”被着重强调,而在传播过程中具有真实且复杂的生命感受的“人”则被简化甚至忽视,这种强烈的工具理性精神与实用主义特色受到许多现代学者的质疑与批判。

精神交往理论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科学模式,具有丰富的人文意涵与人本主义色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传播本质上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平等的精神交往过程,传播的参与者也不能简化为优势的传者与被动的受众。因而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的激荡、价值的碰撞和思想的对话交锋过程”与“知、情、意的精神融通过程”^[27]。区别于传统传播学强调对传播对象的劝服与控制,精神交往不以参与传播活动的任何一方为中心,由双方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实现。精神交往的过程应充分理解为尊重彼此的意愿,不具备任何侵略性的目的与开展任何强制性的行为,同时交往主体能够通过相互审视与协调不断调整和修正各自的传播目的,让双方的需求尽可能都得到满足,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在充分肯定和提升人在传播活动的主体能动地位的同时,精神交往在另一方面也为重新理解媒介的角色与功能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传播过程中的人与媒介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媒介不应成为“权力的媒介”,对传播对象施加影响,而是要在人类精神交往中还原回桥梁与纽带的中介属性。这启发着我们要警惕媒介因其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枢纽位置与扮演的中介角色而可能发生的扭曲,避免无形中放大媒介的权力,而是要推动媒介强化服务意识。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其理论指归,要求以人作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与社会进行研究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指导下,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构建,首先要明确交往是国际传播的本质内涵。基于此,国际传播不是单向的输出和改变活动,而是通过平等交流、接触沟通并实现共同决定的双向过程。这个平等交流过程必然要以充分尊重传播双方彼此的文化个性与传播意愿为前提,同时要通过不断优化改进交流思路 and 方式来保证效果,实现目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播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深刻结

合,精神交往的理论启示有助于真正理解国际传播中主体间精神联系的内在动力,弥补既有国际传播范式构建的不足,为超越与匡正当前不合理的全球叙事划定方向。

3. 跨文化到转文化的理论转向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向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理论转向,推动着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叙事建构中“视角转换”的重要性。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传播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以我为主”的推广和落地,更要从“实体性思维”转向“关系性思维”^[28],通过青春化、共同化叙事,在不同文化间创造联结,为文化间的交融、互构与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跨文化传播自二战后诞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积累与建构,逐渐发展为认识和解释国际传播活动的一种主要理论图式。跨文化传播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国际传播在二战后期所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即如何确保美军在占领的岛屿与当地居民沟通合作,以及如何推动新成立的国际性机构与海外基地能够在当地有效发展^[6]。观察、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与心理由此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项主要议题。这种诞生与发展语境天然决定了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现代化为中心的话语体系。

从相当的程度上说,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服膺于美西方视角下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文化间的异质性,将不同文化看作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实体,主要关注这些彼此独立的文化实体之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而“跨”就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物理限制,从传播主体的属性特征与利益需求出发,考察传播主体如何策略性地将自身的文化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向其他文化社群输入,特别是解决在传播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与冲突而导致的传播不畅问题,以实现对目标受众价值观的塑造和重构,对当地社会发展实现影响和干预。

这种关于国际传播的认知图式一方面使美西方将自身文化世界观作为现实核心,另一方面也默认了在国际传播与文化交往中存在“先进”与“落后”相对立的二元结构^[29]。然而,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跨文化传播在理论解释层面逐渐遭遇困境。而如若我国在构建新型全球叙事体系的实践中沿用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则可能面临“刻舟求剑”的风险,现实迫切需要一套契合时代语境的新的理论框架予以分析和指导。

为有效适应和精准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最新阶段与最新特征,以转文化传播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予以升级与修正得到支持。当前,转文化传播的阐释路径还未形成完整意义的理论架构,仍处于“进行时”的知识建构^[30]。转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启发与滋养,如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对古巴烟草与蔗糖两种生产模式的分析辩证中提出,古巴历史是“相互交错的转文化历史(history of intermeshed transculturalizations)”^[31],萨义德则曾指出异质性的文化“包含在彼此之中”。转文化传播回应了当前我们难以为某个文化现象贴上单一国家或地区标签的客观现状,为描述和理解国际传播与全球文化交流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势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工具性概念。转文化传播将文化视为不断互构转型的动态历史过程,而非静态的主体,其假定全球化时代之下不同文化均有着相互连接、相互混融的内生取向^[32]。

因此,其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媒介文化如何发挥影响力,“在各国社会文化的动态空间中不断拓展与粘连,从而生成新的‘文化杂糅’或‘第三文化’”^[12]。从文化个体而言,转文化传播强调在国际传播中对外部文化进行检视、过滤、吸收与内化,从而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造与完善,实现文化的转型、超越与再生产。相较于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一方面突破了文化异质性的传统认识论,另一方面对以往“中心—边缘”的叙事逻辑予以纠偏,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历史丰富性。转文化传播启发着我们要加强与全球各种文化间关系网络的建构,给予不同文化主体更多自我表达和相互交流的平台,从人类文化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与历史站位出发,以互联互通、共生共荣的理念推动全球文化的不断融合创新。

4. 话语的偶然性与主导地位的建构

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冲突与变革可通过话语得到具有信服力的解读^[33]。将阐释视角切换至话语的维度展开,话语的偶然性与话语主导地位建构的客观规律,不仅能够有力支撑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的五点内涵的合理性,同时也展现了它们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内在作用机制。

全球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以世界作为实践场域的话语,是“意义不断得到协商与建构”的结构^[34]。从以拉克劳与墨菲为代表发展而来的新一代话语理论来看,话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非闭合结构”,其

天然具有偶然性(contingency)。这种偶然性来源于话语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

一方面,话语以接合实践的方式(articulatory practice)将来源于话语场域中的一系列元素接合起来建立表意链条,使其构成“意义结构网络的一部分”^[35],并呈现特定的意义面向。当物质世界产生的新的事件无法被纳入特定的话语,新元素的引入与旧元素的脱离等时常在话语内部发生的变化,都会对意义结构造成冲击,使话语受到扰乱和破坏。

另一方面,接合使得话语场域中的部分元素被纳入特定话语,但也导致了一种意义结构与它可能的替代性系统间的天然分野。有学者将其阐释为话语场域的“结构二元论”,即总有话语结构的彼此相对^[36]。不同的话语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竞争,争夺为某一特定现象赋予意义,以此打破既有秩序来建立其他形式的主导性观念。这种根植于话语内与话语间的偶然性,使得通过接合实践构建起来的话语不断经历着去接合(disarticulation)与再接合(re-articulation)的过程,使“话语不断改变、脱节,并再次引入偶然性”^[37]。

话语的偶然性决定了话语场域中围绕同一个客体存在多种话语接合,也指出了以“其他方案”调整、改造乃至取代既有主导性话语体系的可能。所谓话语的主导地位,指的是一种话语能够在同其他话语的角力与对抗中取得胜利,从而使其对于某一事件或事物的意义固定上升为社会层面的意义秩序,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视为理所应当的社会想象^[38]。在话语的接合实践中,对于不同元素的连接和整合主要依靠在话语中占据特殊位置的一种能指完成,拉克劳与墨菲称其为节点(nodal points)。也正是这些节点完成了对于话语意义的相对固定。而要取得话语的主导地位,话语主体需要依托话语性节点,在不同话语中的元素间进行勾连,将其接合进入表意链条,从而将人们对不同话语的认同转化为多元接合实践的汇合点,“将不同的认同相连接并纳入共同的议题之中”^[39]。

另外,对于其他话语中元素的接合,也使得这一元素在不同的语境中脱离了原有话语对其意义的固定方式而生发出新的意涵,通过展现这一元素的多种意义面向揭示话语建构的偶然性与能指本身所承载意义的浮动性,从而对原有话语的建构形成消解和削弱。这也正是话语理论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理论价值的集中与直接体现。

话语的偶然性及其主导地位的建构性特征,得

以让我们从深层次的理论视角认识到,长期垄断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美西方话语体系并不是天然的、既定的,其本质上与关于全球化的其他话语一样,同样具有被挑战与动摇的可能。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努力推动的新型全球叙事体系的探索与未来发展,我们应抱有充足信心与乐观态度。

而就打破美西方在全球叙事领域的话语宰制而言,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展现同一议题在不同话语中的多元意义,并且正面地就这些议题进行个性化、平等化的解读,通过揭示、还原美西方话语的偶然性来解构其在重要概念、关键议题、国家与地区形象、文明与文化等方面的霸权性建构,发出多元声音,壮大全球南方声量。

另外,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全球叙事所主张的五点内涵,也正与话语理论的核心逻辑形成了有机回应,在全球叙事书写中通过最大化地求同存异、平等交流、共同发展,实现不同主体的最大化联合,构建目标与诉求一致的异质、多元、广泛的叙事主体、参与主体,实现全球范围内多元身份与认同的整合和统摄,从而使新型全球叙事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下的个体所广泛接受,成为新型全球化图景下受到人类广泛认可与支持的普遍性方案。

五、余 论

“我们都生活在美利坚,可口可乐,还有不时的战争”(We're all living in America, Coca Cola, sometimes war),这是德国一支由东部地区工人团体组成的摇滚乐队在名为《美利坚》的歌曲中唱到的歌词,以近似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也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西方长期主导下的全球叙事图景。

自工业革命以降,欧美中心主义长期掌控着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国际传播格局一度演化为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范式的系统。这种单极化的全球叙事本质上发挥的是“化全球”而非“全球化”的效用^[40]。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与国际传播格局的演变,美西方版本的全球叙事中所存在的逻辑褶皱日益凸显,遭遇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质疑与警惕。这种褶皱首先体现在从天命观念出发的“自由流通”。其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通”叙事,实际是一种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救赎”世界各地的秩序想象,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界定为“非历史的蛮荒

之地”,对后者的文化价值进行丑化与诋毁。其次是软性方式中暗含的强行改变。其主要通过各类大众文化产品与教育交流、资金资助等隐性形式进行传播,实际意在通过长期影响与劝说实现全面的文化支配与意识形态颠覆,进而强制改变他国的精神家园与价值信仰。最后是“文化多元”包装下的单一价值。美西方尽管鼓吹文化多元与平等包容,但事实上只强调和认可自己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从而在实质上形成了对多元化的虚假倡导与实际压制。

新型全球化图景下的国际交往是国际传播格局去中心化与重心下沉的过程。作为国际传播领域全球南方的关键行动主体之一,中国在“自我发声”的传播实践中,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逻辑,同时将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繁荣落到实处,展现出了中国道路在重构现代国际秩序中的世界意义,为全球南方带来了积极行动的可能性与有效方向。

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释放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将对我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理解与阐释从更加宏观的全球视域展开。在理论与实践的勾连中,我们得以透过我国国际传播的理念、行动与经验提取新型全球叙事体系的基本内涵。中国倡导和引领的新型全球叙事集世界多元于一体,具有平等化、个性化、青春化、立体化、共同化的主要特征,致力于突破“主体—客体”的传统传播逻辑,推动国际传播融入全球范围内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活动,实现真正意义上信息的自由平等流动,以自觉、自主、自愿的交流凝聚全人类守望相助,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通问题。

这一新型全球叙事方案可能就是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能够切实有效应对全球叙事单极化困境的解决之道。而要深入推进我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构建与发展,就要在保持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与以中国为方法的实践自觉前提下,以“尚公”“和合”观、精神交往、转文化传播与话语建构的理论启示为基础进行知识建构与范式创新,指导对外传播实践不断推陈出新,更好地掌握全球叙事体系建构的主动权与主导权,探索既相互容纳吸收又转型共荣的全球文化新形态。

在传媒科技不断推动全球信息传播生态大转型、大调整的今天,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基于已有发展势能,更加重视深入挖掘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数字

媒介技术的战略价值与内在潜力,为赋能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建设打开新格局。一是依托 AI、XR、虚幻引擎、4K 等数字技术推动“视频天下”的秩序构建^[41],发挥好视听传播在提升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生力军作用,扩大优质视听内容产能,持续释放视听创作创新潜力,以虚实同构、直观可感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吸引海外用户注意力,形象生动地讲好新型全球化的理念与故事,促进跨文化理解与认同。二是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力度。一方面,通过合作推动数据资源共享与整合,建立更加全面的国际传播数据池;另一方面,不断强化 AI 数据大模型的建设与完善,开发具有中国价值、全球格局与跨文化适应性的自主算法模型,推动新型全球叙事在全球范围的精准传播与高效传播。三是在深化统筹协调与垂直整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数字媒体平台建设与出海探索,构建具备时空“同步”连接性的全球信息网络,激活海外用户主动参与平台内容生产的意愿与热情,为民间交流与民心相通创造更加广阔与自由的空间。

国际传播格局的发展趋势、相关理论体系的演进动向,以及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探索中的一系列成功案例,无不证明我们正在积极构建中国引领和倡导的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中找准方向。但我们也需要对一些问题保有清醒认识与持续反思,新型国际传播全球叙事体系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效工作,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决心。在长期的探索 and 实践中,我们既要有坚定方向、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也要具备根据客观实际灵活动态调试的智慧与策略。在新型全球叙事的建设过程当中,要注意在引领与协商之间做好平衡,始终秉持“协力”而“不胁迫”的意识。此外,作为新兴国际传播全球叙事的引领者与倡导者,在实际国际传播中我们还需要明辨:讲好中国故事但不能只讲中国的故事,更要着眼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丰富故事素材,以中国式的全球文明观讲好人类共同故事。

参考文献

- [1] 金伟,李梓齐.提升全球叙事能力 擦亮城市国际名片[N].光明日报,2024-09-29(11).
- [2] GADE C. What is Ubuntu?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mong South Africans of African descent[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2(3):484-503.
- [3] CABALLERO S, HUERFANO H, ROJAS C. Communicology of the South: The Bases of a New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M]//Communicology of the South: Critical Perspective from Latin Americ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19-53.
- [4] MIKE Y. An Asiatic reflection on Eurocentric bia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7(2):272-278.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 [6] 张毓强,潘璟玲.国际传播的实践渊源、概念生成和本土化知识构建[J].新闻界,2021(12):41-55.
- [7] WINOKUR J. The Cold War trap: 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 foreign policy[J/OL]. (2023-07-13) [2025-02-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old-war-trap-america-foreign-policy>.
- [8] U.S. Defense Depart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Version 1.0[R]. Fairfax: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2009: iii.
- [9] GERSCHENKRON A.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20-176.
- [10] 汪一鸣.不发达地区区域开发的几个理论问题[J].地理学报,1993(6):497-503.
- [11]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as a contested concept[M]//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7-30.
- [12] 史安斌,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J].当代传播,2020(1):18-24.
- [13] 常江,史凯迪.霍米·巴巴:理论建构是一种赋权的政治——文化错位、流散与身份政治[J].新闻界,2019(1):14-19.
- [14] 贾布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EB/OL]. (2022-01-17) [2025-03-02]. <https://news.cri.cn/20220117/848ace0f-8138-6ab2-fdab-c72eaacbb73b.html>.
- [15] 布雷斯特林,冯瑾.“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J].当代世界语社会主义,2012(1):157-162.
- [16]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0.
- [17] 赵磊.“劝服的艺术”还是“精神交往”?——论国际传播的特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1):79-83.
- [18] 刘俊.论融媒时代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力提升的十个创新理念[J].东岳论丛,2020(9):87-96.
- [19] 刘俊.融合时代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发展纵览与养成之道[J].电视研究,2018(2):17-19.
- [20] 王庆福,陈巧巧.与“他者”对话:重构“中国故事”的叙事话语[J].电影评介,2018(16):8-11.
- [21] 漆亚林.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进路与路径选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4):5-14.
- [22] 李思孝.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现实意义[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6(1):78-80.
- [23] 胡百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思维与路径[J].对外传播,2022(9):8-11.
- [24]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410.
- [25] 陈力丹.名词定义试拟:交往、世界交往(Verkehr, Weltverkehr)[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111-116.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

- [27] 李欣人.再论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与传播学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8):19-23.
- [28] 周佳琪.关系编织、转化式繁衍与世界主义风险共同体:中国全球传播的“转文化”路径[J].国际新闻界,2024(12):6-29.
- [29] 史安斌,梁蕊洁.转文化传播视域下“数智华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 ReelShort 为例[J].青年记者,2024(2):86-92.
- [30] HEPP A.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M]. London: Wiley Blackwell, 2015:1.
- [31] ORTIZ F.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47: 162.
- [32] KRAIDY M.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0.
- [33] DRYZEK J. D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 Discourse and democracy in a divided world.[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155.
- [34] LACLAU E. Metaphor and social antagonisms[M]//NELSON C, GROSSBERG L.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8: 249 - 257.
- [35] 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M].付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34.
- [36] JACOBS T.The dislocated universe of Laclau and Mouffe: An introduction to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J]. Critical Review, 2018(3-4): 294-315.
- [37] CARPENTIER N. The dislocation of the empty signifier freedom as a tool in global political struggles: A case study on RT's mini-series How to Watch the New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2021(1):66-81.
- [38] LACLAU E.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M]//LACLAU E.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1990: 3-85.
- [39] HOWARTH D.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M]//SCARBROUGH E, TANENBAUM E.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New Approach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268-293.
- [40] 史安斌.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J].国际传播,2018(5):1-5.
- [41] 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1):1-8.

On the New Global Narra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ed and Advocated by China

Liu Jun Weng Xudong

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enters a period of in-depth adjustment, and in the face of the contextual changes and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logical cracks in the global narrative system long monopolized by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ontinued to deepen, falling into an insurmountable interpretive dilemma. As an active actor in the Global South, China, while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to the world, has brought effective direction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global narrativ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new global narrative led and advocated by China include at least: an equalized narrative that promotes open and free exchanges among subjects; an individualized narrative that highlights national charm and diverse expressions; a youthful narrative that strengthens expressive innovation with an internet-savvy voice; a 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that faith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imag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a shared narrative that promot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resonanc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ialectics of diverse knowledge genealog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is new global narra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valuing commonality” and “cherishing harmony”. It takes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sm as its ontological basis, demonstrates episte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echo the paradigm shif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orm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ontingent nature of discourse and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discourse dominan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communication; new global narrativ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茅 如